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

• CHINA
• USA

1

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
中美关系史丛书·论丛
重庆出版社

中美关系史丛书·论丛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

第一辑

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重庆

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丁名楠
编委 乔明顺 邓蜀生 罗荣渠 张振鹏
秘书 袁鸿林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 第一辑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375 插页2 字数296千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800

书号: 11114·65 定价1.83元

序

关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基本上陷于停顿。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这个研究工作才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这几年来，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学术界发表了一百多篇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就中美关系史上的各个方面以及若干重大问题，例如，美国对华政策的性质问题，美国在华各种人物和机构活动的实质作用，等等，展开了饶有意义并已引起人们深思的争论，真正做到了各抒己见，思想活跃，情况极为可喜。

现在“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从这一百多篇论文中，选出了若干篇，辑为“论丛”，准备出版，这不仅是我国中美关系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件大好事，对我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工作也是一项宝贵贡献，值得我们庆贺。

研究中美关系史，同研究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关系史一样，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因为只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才能加强著作的科学性，使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过去，认识现在，预测将来，并为今天和今后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提供可靠的依据。在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的今天，开展对中美关系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这首先要我们的研究工作者把一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作出全面而周到的分析。这三个因素——时间、地点、条件——都必须注意到，缺一不可。这就要求我们对当时中美两国的国内外情况作出认真的研究分析。还要求我们对当时总的国际形势作出认真的研究分析。

其次，要求我们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历史事件。对美国同中国关系的研究，不能不同美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联系起来。美国是从1900年以后才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但在这之前已经同中国有了一百多年的交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又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进入了所谓“美国世纪”(Pax Americana)的阶段。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变化以及每一个历史阶段中美国政治、经济总要求的变化，都不能不对美国对外政策，其中包括对华政策(乃至对在美华人的政策)的变化，起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要求我们坚决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做研究工作。不能感情用事，不能一概全面否定或者一概肯定，而应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来作出恰如其分的正确的分析。

第四，为了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除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统帅自己的研究工作外，非常重要的是要下功夫搜集大量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大量材料中理出事实的本来面目。

过去几年我们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是有成绩的。在百家争鸣的空气中，一个良好的学风正在形成。我希望我们的研究工作者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进一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这样，新的研究成果将不仅能增加人们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历史的了解，也会大有助于人们对

当前现实的了解。

肖 亨

1984年10月8日

目 录

- 前言.....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
- 序.....宦 乡 (1)
- 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汪 熙 (1)
- 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还是向后倒退？
——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
.....丁名楠 张振鹤 (14)
- 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罗荣渠 (40)
- 关于“中国皇后”号来华问题.....齐文颖 (63)
-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
——兼论清代闭关政策的破产和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勃兴
.....陈胜彝 (76)
-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处境
.....朱杰勤 (135)
- “门户开放”：美国对华政策史一页.....吴嘉静 (165)
- 辛亥革命前夕美国对华政策研究
——兼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失败.....卿斯美 (186)
- 谈湖广铁路借款的恶债性质.....刘大群 (226)
- 容闳述论.....袁鸿林 (239)

中国和华盛顿会议*.....	蒋相泽	(272)
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远东战略及其演变		
.....	王斯德 李巨廉	(289)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	何迪 曹建林 翟卫华	(311)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与马歇尔调处.....	屠传德	(336)
历史的考验		
——新中国诞生前后美国的对台政策		
(1)	资中筠	(350)
1979年至1984年6月国内中美关系史研究述评〔附录〕.....		
.....	袁鸿林	(368)

略论中美关系 史的几个问题

汪 熙

从1784年2月28日满载人参与银元的“中国皇后”号自纽约抵达广州，到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经历了一百九十五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美关系历经曲折，有历史的创痛，也有美好的记忆。经过三十年的断绝关系，“对抗已经结束”，而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中美友好发展的广阔前景。现实生活是历史的延续。更好地总结中美关系的历史，以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推动这一伟大事业的发展，是当前摆在中美两国历史学界的一个共同的课题。这里想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关系，总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对比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考察国际关系的历史，也只有在比较中才能鉴别，在鉴别中才能得出较客观的评价。例如，关于领土完整的问

题，是我国近百年来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的一百零九年中，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领土进行了频繁的掠夺。在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占据中国领土的国家。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俄都以局外人的身份进行“调停”。但是沙俄一面进行“调停”，一面却趁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时，以重兵直趋黑龙江，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璦琿条约”，强行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在此以前，美国驻华外交代表巴驾在美国商人的怂恿下也曾多次向国务院建议要占据台湾，但是美国政府没有同意并撤换了巴驾^[1]。到一八九八年，当我国正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时刻，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又建议国务院在直隶地区割据一个海港来“扩大美国的影响”。这一建议再一次为美国政府所否定^[2]。1900—1903年，美国海军割占三门湾和舟山的建议，也由于英、日的阻挠和美国国务院的犹疑和迟滞而未成为事实^[3]。当然，美国政府当时作出这些决定，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我们判断国际关系的标准是实践与事实而不是其他。同别的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同沙俄贪得无厌地掠夺我国大片领土的侵略行为相比较，美国在与我国的关系中所留下的这一纪录，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在我国解放后，美国的这一纪录被他们自己推翻了。1958年9月4日美国总统与国务卿联合声明，美国要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4]。这就违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参加签订的开罗宣言，也是对我国领土与主权的严重侵犯。这是中美关系史中的一个不幸的插曲。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历史过程已经由于中美建交、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宣告结束了。

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评价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899年和1900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并在此前提下，要求美国贸易的机会均等；二是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这两条是互相抵触的。事实上，美国不可能在两者兼顾的情况下执行“门户开放”政策，它只能是有条件的执行。历史的事实证明，“门户开放”政策所宣布的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原则，只能停留在宣言与协定上，美国不愿超过这个限度，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美国在执行“门户开放”政策中，表现出大幅度的摇摆性，摇摆于同其它列强的对抗与妥协之间，而更多的是后者。如1900年“门户开放”政策的墨迹未干，麦金莱总统对沙俄侵入我国东北地区，就采取了默许的态度^[5]。1908年美国与日本签订的《罗脱—高平协定》，既声称“以和平的方法支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又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6]。1915年，国务卿蒲莱安既反对日本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二十一条”，但1917年蓝辛又明确承认“地理上的相邻近，使其邻国享有特殊利益”的原则^[7]。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和1937年日本对我国不宣而战，史汀生国务卿和罗斯福总统根据“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則，都先后郑重宣布“不承认以武力所造成的领土变更”和谴责“没有法纪的‘宣战或不宣战的战争’”^[8]。但是，在宣言和“谴责”的同时，伪满洲国百分之六十六点九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分之八十一一点一的汽油都来自美国^[9]。一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炸弹扔到美国的国土上了，美国才对日宣战，同中国结成了盟友。由此可见，“门户开放”政策的执行与不执行，或执行到什么程度，取决

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和国际政治上纵横捭阖的“权力平衡”趋势，不取决于中国受侵略的程度。远在美国立国的初期，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总统在卸职的告别演讲中曾经说：在决定美国政策时要考虑到“美国自己的利益”^[10]。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美国在南美洲实行封闭的“门罗主义”，在中国实行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作法两歧，但原则同一——从美国自己的利益出发。所以应该看到，“门户开放”政策从本质上说是美国谋求保障和扩大其在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政策，从来就不象有些美国历史学家所宣称的那么“公正”、“无私”和“利他”。但也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即：这个政策毕竟宣布于1899年，我国被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之际；后来在我国历次的民族危机中（如1915年，1931年，1937年）以及多次的国际会议上，美国又曾反复重申这一政策（包括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原则）。由于这个政策也包含着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利益的相对抗的一面，它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三

国际关系固然是受两国之间或诸国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但是各国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常常会形成、影响甚至决定各该国的对外政策，因此，我们研究中美关系就不能眼睛只看见中国的一面，而不看到美国的一面。否则就会流于片面。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争取美国最大限度的利益这一基本因素以外，还有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势力的消长，孤立主义的影响，舆论的压力和经济的繁荣与萧条，等等。如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美国从中调停，时冷时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美国国内舆论的压倒倾向是同情日本，他们认为日本

的胜利是一个愿意改革与维新的小国打败腐朽、保守的大国的胜利。但是，国务卿葛礼山对中国是寄于同情的。当时中国驻美国使馆的高级官员许钰(后任出使义国大臣)根据他亲身的体验说：“葛礼山平素为人清正不阿，凡遇外交事，颇能揆情度理，一秉至公，不似他人视事势以为迁就轩轻。上年中倭衅起，其于中国尤切倦倦，时发正论，以持事理之平，虽与议绅抵牾，卒不少变初念。”^[11]而反对党则利用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当国务卿葛礼山于1894年11月建议由美国出面调停中日争端时，反克利夫兰总统的共和党的《纽约新闻报》就尖锐地评论说：“调停是不妥当的，这样做是为英国的利益服务……一个美国总统与国务卿把中国从日本手中拯救出来是对国际正义的进攻”^[12]。共和党借此掀起一个反民主党的猛烈攻势。研究美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政策时，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又如麦金莱在1897年竞选总统时，曾经大声疾呼，美国在中国的巨大商业利益使美国在中国的事务中不能置身事外^[13]。那时美国的棉织品出口的一半以上销售在中国市场(主要在东北及华北地区)^[14]。到1901年，沙俄对我国东北的控制严重打击了美国棉织品的销售。当时美国南方植棉集团要求政府对沙俄采取“强硬政策”，但麦金莱总统却对沙俄采取了姑息态度。为什么麦金莱这么言行不一致呢？这是因为麦金莱主要是代表美国中西部利益，在总统竞选的年份，为了争取选票不得不说不说一些关注南方利益的话。但是在非竞选年份，南方集团的利益(甚至东部集团的利益)就不足以推动麦金莱冒着对抗的危险对沙俄采取强硬的政策了^[15]。芦沟桥“七七”事变以后，罗斯福发表了“隔离”演说，不指名地谴责日本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但是他的演说，即使是闪烁其词的，也引起了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发表演说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罗斯福不能采取对日制裁的行动。直到1938年1月10日众议院以多数票击败了孤立主义者罗德

楼的议案(该议案要求美国除自卫以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举行全国公民投票来决定),罗斯福才能放手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16]。但是还得继续对美国公众宣传抵制日本在太平洋的侵略同抵制德国在欧洲的侵略是一样重要。这种培养舆论的工作一直做到珍珠港事变以前。至于在经济方面,美国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经济力量突飞猛进的增长(从1850年到1900年,农业生产增加了三倍,工业生产增加了十五倍)^[17]以及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的几次经济大恐慌,是促使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都是众人皆知的。

除国内的因素外,还有国际因素。中美关系始终受到美国与俄国和日本在远东对抗这一事实的影响。十九世纪末叶日本尚在崛起;俄美在远东还未直接冲突。在五十到六十年代,美国琼记洋行甚至代理沙俄在中国的领事职务^[18]。二十世纪以后,美国势力伸向太平洋,沙俄在我国东北的扩张也有增无已,美国在华纺织品的主要市场又正处于沙俄控制的地区,矛盾冲突乃不可免。1900年沙俄趁八国联军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时,突然侵入黑龙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屯的大惨案。同月,海约翰在“门户开放”政策中补入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原则。这应当不是偶然的巧合。日俄战后,形势又为之一变。日俄开始接近,日、俄、英、法结成同盟,美国在远东处于孤立。它在中国的扩张(三都澳的租借、陕西省石油勘探、铁路借款等)处处受到日本的抵制。“门户开放”政策的起草人柔克义在1914年回顾日俄战争的影响时,深感遗憾地说,遏制沙俄在中国东北扩张的这一角色原来是应该由美国来承担的,不幸却落在日本人的身上,使日本成了“权力平衡”的主角^[19]。三十年代后美日在远东的利益冲突迫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与日本的对抗与妥协中蹒跚前进。由此可见,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时,我们若只看见中国的一面,而没有看见美

国的那一面；或只看见中美两国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他的国际关系的一面，就往往会弄不清楚各个矛盾之间相互对抗、制约和转化的运动过程。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科学性与政治性归根到底是一致的，对历史事实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断，将有助于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和从中引出必要的历史教训，从而更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四

传教事业从一开始就成为中美关系的重点。关于它的功过问题争论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赞成者说它是美国对中国的“无私”贡献（已故的耶鲁大学的赖德烈教授是这一说的积极鼓吹者）；反对者说，它是对中国的一种更隐蔽的侵略。从国际关系上看，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的根据是不平等条约。传教士的身份和特权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条款、传教条款等不平等条约紧密纠缠在一起。在某些方面，传教士享有的特权甚至超过了外国商人（如深入内地和在内地购置产业的特权）。他们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和憎恨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解决民族独立和饥饿问题的时候，传教士却送来了圣经，不受中国人民欢迎也是理所当然的。美国在中国的教会势力曾经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不小的因素。而这个影响极坏，甚至前国民党政府的法律顾问兰巴格法官也曾说：“中国取得自由的最大障碍是那些依附于宗教运动的邪恶的政治势力，它们对西方的政治中心施加影响……在中国解放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受到这些隐藏在教会里的自私集团的抵制”^[20]。兰巴格法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对美国传教事业的评论应该是最不具有偏见的。美国的传教士在传播圣经的

同时，也在中国的土地上办起了新式的学校和医院，传播了科学技术。美国传教士在早期翻译和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方面起过桥梁作用。他们的学校培养了一些买办，但也有不少中国的科学家和政治家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的。

五

促进两国人民的了解是中美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中美两国虽有将近两百年的交往，但相互了解还很不够。美国人过去主要是从马士以及明恩溥牧师等的著作中了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难免继承了他们的观点与偏见。至于对新中国的了解那就不够了。美国花了三十年的时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走了一段弯路(封锁、禁运、遏制、拒不承认)才弄清了以下三个基本事实：新中国不是苏联扩张主义的马前卒；新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共产党“自行崩溃”(杜勒斯语)^[21]是一个神话。而这些事实本来早就是一清二楚的。由于时代的转换和将近三十年的隔绝往来，中国也需要了解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社会和制度确有其不可克服的痼疾和阴暗面，但它还没有到“濒临崩溃的边缘”，它的生产力还有巨大发展的潜力。美国人民是开朗、率直、勤劳和讲求效率的，这些好的品质，我们新的一代知道得很少。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历史给予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总结，在增进中美友谊的现实生活中是多么重要。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应该承认，美国历史学界在这些领域中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77年，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包括中美关系史)的书籍出版了一千八百六十四册，其中大约八百册左右是美国历史学家的著作。相比之下，我们远远落在后面了。解放后，我国在这一方面的著作

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本。当然，已出版的著作在质量上还有待于提高。在西方世界，象二十四卷本的《历史家的世界史》那样大部头的著作把中国的贞节牌坊当作凯旋门^[22]的笑话，近年来是没有了，但在美国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中还有错把义和团运动当作太平天国革命和把袁世凯当作辛亥革命领袖的^[23]。除了对中国的历史情况不熟悉以外，还有一些美国历史学家脑子里仍然被反动的“白人的负担”的幽灵所缠绕，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打扮成“救世主”的角色^[24]，公开宣称美国商人在华经济活动“不是帝国主义的”^[25]，并发明了许多“理论”证明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促进了中国的“进步”^[26]。有的甚至在论述中美关系史时，一再扬言对标志着中国革命胜利的共产主义采取“强烈的批判态度”^[27]，等等。这自然已经不是无知，而是明显的偏见。我们不能期望从这种“强烈的”资产阶级偏见中，获得有关中美关系史的公正、科学的论述。而且理所当然地要对他们的论点持以认真的商榷和反批判的态度。

国交的阻隔也限制了学术研究的质量，密执安大学的费伟凯教授关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书是一本呕心沥血之作^[28]，但关于书里的主角盛宣怀却没有一条第一手的资料。而我们写“门户开放”政策却看不到海约翰的亲笔文书(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写早期中美关系史的看不到旗昌、琼记洋行的档案(藏哈佛大学图书馆)。缺少第一手的资料就不能不影响科学研究的质量。我们相信通过今后两国友好交往，会逐步提高我们的历史研究的质量。

六

有关中美关系的史册中，友谊的篇章不应该泯灭。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工人对美国西部建设起过很大的作